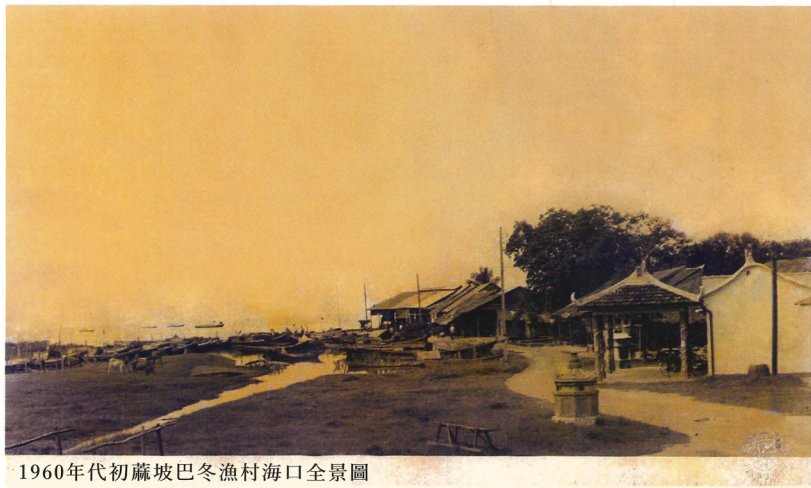


學文

2019 · 2



1960年代初麻坡巴冬漁村海口全景圖

KDN: PP18588/10/2014(034051) RM13 S\$10 USD8





目
录

文史学苑

- 5 《唐代科举与试赋》评介 / 姜子龙
12 《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子部文言小说著录
来源考 / 郑诗侯

本地研究

- 16 吉打华人甲必丹研究——以李欲修生平事
迹为例 / 阮湧洸
24 福善在人间——老越华人福德正神信仰初
探 / 阮光安
35 新马会馆史研究第一人——吴华的乡土史
论述 / 张雪馨、安焕然

掌故丛谈

- 55 广帮侨领黄树芬在日据时代前后的踪迹 /
张礼铭
59 巴冬渔村历史掌故系列（一）：1950年
代的渔网 / 陈荣辉
63 葉大白（诗山一葉）——我的阿公 / 葉
詠虹

67 厦大马校图书馆的“两桶金”：附捐书人的两篇文字 / 萧德洪

专题

77 马来西亚的福建话 / 李永球

学人自述

90 关注华人命运——坚持不懈，探索采访 / 郑昭贤

书话

108 历史偶然性肇建的多元国度——读廖文辉编著《马来西亚史》及其他 / 詹缘端

学生园地

117 华文小学低年级字理识字教学试点研究 / 林心思



吉打华人甲必丹研究 ——以李欲修生平事迹为例

阮湧伊

一、前言

据考古资料观之，吉打早期较重要的海港——布秧谷，约五世纪时，属于印度化王朝，古称“古吉打”。那时候，日莱峰（Gunung Jerai）是古吉打海上的自然地标，使布秧谷成为了印度、中东或中国商船的重要停泊站。¹加上季候风的转变，古吉打也成为一个东、西方商船可以短暂停靠及维修的海港，并等待季候风的转变期间，进行一些买卖商业交易。同时，经考古学家考证，发现吉打的双溪玛斯，亦是吉打的其中一个国际海上贸易港口，皆有中东、印度、中国的商人到来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在1992年至2001年期间，在双溪玛斯发现到大量中国陶器，当中唐朝（618-906）与宋朝（960-1279）的陶器数量不少，如石器、陶瓷、瓷器等。²这也足以证明华人到来吉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七世纪。发展至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吉打统治者曾经提出许多优惠待遇（包括提供土地），以吸引华人到来吉打发展。当时吉打统治者的举动吸引不少华人到来定居，尔后还委任华人领袖为华人甲必丹，以期有效的管理当地的华人社群。

然而，有关吉打华人甲必丹的历史，仅有黄存燊所撰写的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内容较为丰富，叙述了海峡殖民地及吉打、玻璃市、霹雳等马来土邦的华人甲必丹生平简介。其中，在吉打曾有三个地区，共六位华人领袖被委为华人甲必丹，包括瓜拉姆打（姓名与生卒年不详）；亚罗士打的李欲正（?-1885）、李欲修（?-1888）、戴春桃（1828-1922）；居林的赵亚爵（生卒年不详）与罗启立（1867-1943）。³至于吉打华人甲必丹的任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苏丹阿默·达朱汀·哈林沙二世（Sultan Ahmad Tajuddin Halim Shah II）统治时期；第二、苏丹阿默·达朱汀·姆加兰沙（Sultan Ahmad Tajuddin Mukarram Shah）统治时期；第三、苏丹阿都·哈密·哈林沙（Sultan Abdul Hamid Halim Shah）统治时期。

其中，华人甲必丹李欲修则是从苏丹阿默·达朱汀·姆加兰沙时代就受到器重，被封为 Dato Vijaya Besara。之后，其还在官中多年，直到苏丹阿都·哈密·哈林沙时代。李欲修可是唯一曾服务过三位吉打苏丹的华人官员，可称得

上是吉打苏丹身边重要的官员之一。1888年，李欲修逝世，李欲修原先享有的特权转移至甲必丹戴春桃。然而，在吉打坊间对李欲修的论述并不多，甚至亦有偏差。本论文将会以吉打华人甲必丹李欲修作为研究对象，旨在研究吉打华人甲必丹的发展，并对李欲修的生平与在社会的角色加以考证，以期能重构李欲修在吉打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二、吉打华人甲必丹历史发展

有关甲必丹制度（Kapitan System）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6世纪的葡萄牙统治时期。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在处理诸多繁杂的港贸事务方面，面对诸多问题，因而推行“甲必丹末”（Capitão-mor）制度。甲必丹制度自葡萄牙殖民者在马六甲推行之后，荷兰、英国殖民统治者及马来土邦统治者，也相续沿用此制度。当时西方殖民统治者或马来土邦统治者推行甲必丹制度，志在透过此制度维持当地治安，让社会能稳定发展。直到1808年与1826年，英国殖民政府先后在槟榔屿与马六甲终止甲必丹制度。虽然此制度不再受到西方殖民统治者所用，但马来半岛土邦的统治者却效仿西方殖民统治者，推行甲必丹制度。

华人甲必丹虽由葡萄牙人推行，再由荷兰人、英国人及各个马来邦的统治者所效仿，但实际上在效仿的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华人甲必丹的发展模式并非一样。首先，华人甲必丹并非由单一方言群体来担任华人甲必丹，而是靠着地理位置及行业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如沿海一带的地方，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的都市——马六甲、槟榔屿、吉兰丹、登嘉楼、彭亨、柔佛、吉打、玻璃市等地方，华人甲必丹的籍贯都多以闽南、广府为主，尤其闽南更是占多数。直到19世纪中，锡矿业开始盛行，华人往内陆移居，以开采锡矿为生，华人方言社群的权力开始转变，内陆的城市，如森美兰、吉隆坡、霹雳，华人甲必丹都是由客家人担任，这些客家籍甲必丹多为矿工出身，甚至吉打最后两任甲必丹也是由客家人担任。⁴

华人甲必丹委任的模式，有几个不同之处：一、透过华人社会自行推举人选，并由统治者来筛选；二、对当地社会有功者，而委为华人甲必丹；三、家族继承，因此形成世袭。⁵从这三个不同模式，可以看到华人甲必丹在马来土邦的发展，不全然一致，而是以各马来土邦的统治者委任的情况而定。从历史发展观之，华人甲必丹的历史久远，更在马来半岛的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统计，马来半岛至少有75位华人领袖曾被委为华人甲必丹。⁶由此可见，华人甲必丹在马来半岛的社会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同时拥有控制华人社会的能力，成为华人社会与统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

至于，在吉打方面，当地华人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地方，主要以瓜拉姆达、亚罗士打与居林。当中瓜拉姆达是最先委任华人甲必丹的区域，亚罗士打与居林两个区域，之后也有华人领袖受委为华人甲必丹。首先，在19世纪，瓜拉姆达属于收集华林(Baling)与高乌(Keroh)锡米的主要城镇，而姆达河(Muda River)则成为当时输送或输入货品的主要港口。⁷早在1825年，海峡殖民地档案就有一位瓜拉姆达区的华人甲必丹记载，不过没有详细记载其姓名。⁸这可能因1811年，苏丹阿默·达朱汀·哈林沙二世将吉打首都改为瓜拉姆达后，为了带动当地的发展，及加强与檳榔屿的商业关系，就此委任华人甲必丹，以协助处理当地税收的事务。然而，有关瓜拉姆达华人甲必丹的事迹，只能掌握1825年至1826年，之后的事迹则无法得知。

在苏丹阿默·达朱汀·哈林沙二世统治期间，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区的华人领袖被委为华人甲必丹的记录。1843年，苏丹阿默·达朱汀·哈林沙二世去世之后，由东姑·柴纳·拉昔当上吉打第23任苏丹(1843-1853)，称为苏丹柴纳·拉昔一世(Sultan Zainal Rashid Muazam Shah I)。苏丹柴纳·拉昔一世继位后，吉打刚与暹罗停战不久，到处留下遭到破坏的痕迹。因此，推行一系列振兴吉打的政策，不过，在苏丹柴纳·拉昔一世统治时期，未发现华人领袖受委为甲必丹的记载，直到苏丹阿默·达朱汀·姆加兰沙上位后(1854-1879)，才再次委任华人领袖为华人甲必丹。

苏丹阿默·达朱汀·姆加兰沙继位后，继续执行已故苏丹柴纳·拉昔一世所推行的振兴吉打政策。在那时候，吉打苏丹开始兴建从亚罗士打通往宋卡的公路，同时还拨土地给华商，并鼓励他们在这些土地上种植胡椒、豆蔻、咖啡与丁香等农作物，那时候吸引不少华人来吉打经商。⁹苏丹也因此道路的建成及当地华人人口的增加之际，再次委任华人甲必丹，以处理华商在亚罗士打做生意所面对的问题，当时被委为华人甲必丹者有两人，即李欲修和李欲正。李欲修与李欲正，是吉打土生土长的福建籍华人，他们为兄弟关系。年幼时，在马来社会成长，并就读于巫校，因而都精通爪哇文，深获华巫两族人士的尊敬。马来社会也称李欲修为Eh-ma(阿玛)，李欲正为Eh-tok(阿督)。他们被苏丹委任为吉打甲必丹后，李欲修则被封为Dato Vijaya Besara；李欲正则为苏丹的私人秘书，协助华人解决问题，同时还协助推动吉打的经济发展。¹⁰

苏丹阿默·达朱汀·姆加兰沙在位期间，只在亚罗士打委任李欲修与李欲正为华人甲必丹，并没委任其他华人领袖为华人甲必丹。1879年，苏丹惹诺·阿比汀·姆阿占沙二世(Sultan Zainal Abidin Muazzam Shah II)继位后，继续委任李氏两兄弟为华人甲必丹。不过，苏丹惹诺·阿比汀·姆阿占沙二世继位两年后就去世，导致吉打王室面临继位危机。最终，暹罗国王认可东姑阿都·哈密登基，并称为苏丹阿都·哈密·哈林沙。1882年，苏丹阿都·哈密·哈

林沙继位后，李欲修更受委为财政司一职，当时林氏可称之为“三朝元老”。同时，苏丹阿都·哈密·哈林沙还委任戴春桃为甲必丹。直到李欲正及李欲修去世后，才由戴春桃继承李欲修在世时的任务。¹¹

至于居林方面，大约 19 世纪下半叶，因发现拥有丰富的锡矿蕴藏量，吸引华人移居到居林开采锡米。居林华人人口的增加，让义兴公司与和胜公司的势力在居林开始建立起来。义兴公司与和胜公司，曾在 1882 年及 1888 年发生严重的械斗事件，更影响了居林的经济。¹² 苏丹阿都·哈密·哈林沙则是因为居林的治安问题，先后委任赵亚爵和罗启立为居林华人甲必丹维持当地治安。从档案记载，罗启立不只是华人甲必丹，还兼任当地警长一职，负责维持当地秩序。¹³ 这三个地区因华人大量移居的情况下，吉打苏丹效仿西方殖民者，委任华人领袖为甲必丹；同时可以看到华人甲必丹在不同区域，却有着不同的任务，虽然同样是负责华人事务问题以及维持当地的秩序，但亚罗士打的甲必丹还得负起了推动当地经济的责任。

自苏丹阿默·达朱汀·哈林沙二世到苏丹阿都·哈密·哈林沙统治时期，瓜拉姆达、亚罗士打及居林三地，共六位华人领袖被委为华人甲必丹，并获得当地社会各种的餉码承包权，同时也对吉打社会有着一定贡献与影响力。这六位华人甲必丹中，甲必丹李欲修自苏丹阿默·达朱汀·哈林沙二世到苏丹阿都·哈密·哈林沙统治时期，曾在三位苏丹统治时期服务，可称其为“三朝元老”，可见其在吉打的影响及地位相当重要，然其生生平事迹则较少受到重视。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厘清李欲修在吉打的生平事迹，尔后探讨其在异国他乡的成功之因素。

三、李欲修生平事迹之探讨

李欲修 (Lee Yok Siew, ?-1888) 是吉打土生土长的福建籍华人，其父亲李蛋观约 1820 年之前后，从中国福建省漳州县抵达巴当格茂 (Padang Kerbau)。之后，李蛋观与当地女生洪姨登结婚，育有李欲修、李欲正及李啻娘。李蛋观去世后，李欲修与家人迁到亚罗士打唐人街定居。¹⁴ 李欲修年幼时，由于在马来社会成长，因此就读于巫校，精通爪哇文，深获华巫两族人士的尊敬。在马来社会，李欲修有着 Eh-ma (阿玛) 之称，其弟李欲正则有着 Eh-tok (阿督) 的称号。

在 1854 年，苏丹阿默·达朱汀·姆加兰沙继位后，推行了一些振兴吉打的政策。在那时候，计划从亚罗士打与宋卡之间兴建一条公路，并拨土地给华人，鼓励他们在这些土地上种植胡椒、豆蔻、咖啡与丁香等农作物，那时候吸引不少华人来吉打经商。¹⁵ 此道路建成后，促使当地华人人口增加，因此李氏

兄弟获得苏丹的赏识，并委任华人甲必丹，以期李氏兄弟能协助处理华商在亚罗士打做生意所面对的问题。¹⁶同时，李欲修也被封为 Dato Vijaya Besara；李欲正则为苏丹的私人秘书，以协助推动吉打的经济的发展。

除此之外，李欲修当上华人甲必丹后，还获得瓜拉姆达与玛莫（Merbok）两地的餉码承包权，可以收取两地的鸦片、稻米、绿豆、锡米制成品、木筏、盐、藤与鸡鸭的税收。¹⁷另外，李欲修还获得吉打传统特利权（Ampun-Kurnia），有权征收某些税收，亦拥有买卖权（Right of Market）和罢度权（Right of Ferry），以保证按期有一定的收入。¹⁸此外，拥有吉打传统特利权的人士，多为吉打苏丹的亲信、政府官员和村长，这也让李欲修在获得不同区域的餉码承包权的特权后，也促使他成为亚罗士打有势力的领袖，同时也让他在商业上获得优势。

从文献记载观之，苏丹阿默·达朱汀·姆加兰沙在位期间，仅有李欲修与李欲正受委任为华人甲必丹。1879年，苏丹惹诺·阿比汀·姆阿占沙二世（Sultan Zainal Abidin Muazzam Shah II）继位后，李欲修继续担任华人甲必丹。不过，苏丹惹诺·阿比汀·姆阿占沙二世继位两年后就去世，导致吉打王室面临继位危机。在1881年，苏丹惹诺·阿比汀·姆阿占沙二世去世后，吉打王室出现两派势力争夺王位。展开王位继承斗争的两派势力为：当时以首相旺·穆罕默德·沙曼（Wan Muhammad Saman）为首的势力，其主要是推荐已故苏丹的亲弟弟——东姑阿都·查立·甫特拉（Tunku Abdul Jalil Putra）为苏丹；另一派是以已故苏丹的叔父材乌汀（Ziauddin）为首，推荐已故苏丹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东姑阿都·哈密为苏丹。其中，材乌汀更组成代表团前往曼谷谒见暹罗国王，要求批准委任东姑阿都·哈密为苏丹。¹⁹在这场王位继承斗争中，最终由材乌汀组成的代表团获胜，东姑阿都·哈密于1882年正式成为吉打新任苏丹，改称为苏丹阿都·哈密·哈林沙。

当时，李欲修就与李欲正及戴春桃也涉及在王位继承斗争派别中，并以材乌汀为首，支持东姑阿都·哈密为苏丹。1882年1月，李欲修率领李欲正与戴春桃跟随材乌汀一班人前往曼谷谒见暹罗国王，要求批准东姑阿都·哈密成为吉打新任苏丹。据黄存燊写到，材乌汀一班人前往曼谷之前，曾表示若失败让暹罗国王批东姑阿都·哈密为吉打苏丹，所有代表将不再回到吉打境内。²⁰1882年1月21日，东姑阿都·哈密顺利成为吉打新任苏丹后，并对忠于他的臣子给予赞赏。因此，苏丹阿都·哈密·哈林沙继续重用甲必丹李欲修，并委任为财政司一职。

李欲修当上财政司后，经常获得苏丹派遣到檳榔屿商讨关于吉打与檳榔屿之间来往的餉码承包权课题，包括处理亚罗士打的鸦片与稻米运输至檳榔屿

的税收。²¹ 李欲修除了拥有餉码承包权，每个月还固定领取吉打政府所给的薪金。据 1885 至 1886 年的文献记载观之，李欲修每个月与两位秘书共享 90 至 100 元之间的薪金。²² 除此之外，苏丹阿都·哈密·哈林沙非常信任李欲修，曾受托往典当铺帮苏丹赎回金链。²³ 由此可见，李欲修自从苏丹阿默·达朱汀·姆加兰沙时代就受到器重，甚至到苏丹阿都·哈密·哈林沙时代，还继续在官中服务，成为苏丹身边重要的官员之一。除此之外，李欲修在吉打社会的地位相当尊贵，如苏丹按期访问曼谷之时，都会向暹罗朝贡“金花”及“银花”，或相关吉打事务的各种访问，李欲修都会跟随吉打苏丹出席。在路途中，李欲修都单独骑着自已购买的大象前去，这反映李氏在吉打社会的地位相当尊贵。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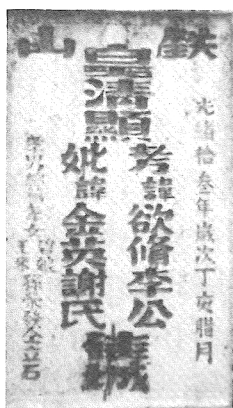
1888 年，李欲修逝世，葬于武吉槟榔 (Bukit Pinang) 义山。后来，武吉槟榔义山遭到政府征用，导致李欲修遗体移至到爪美 (Jabi) 义山。李欲修生前有着一妻三妾，妻为谢金英，妾则是三名暹罗女子 Nu Khuen、Mae Wan 及 Mai Khrea，育有李棉禧、李碧娘和李玉来。(见附图一)

四、结语

李欲修自 19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末，连续服务过三任吉打苏丹，故有“三朝元老”之称号。由于，李欲修与吉打多位苏丹及吉打王室成员关系密切，其在吉打重要的场合中的身份及地位更显然尊贵。这主要与李欲修的成长背景及能力有着莫大的关系，其中有三大方面影响着李欲修的一生，包括交际能力、协商或办事能力及形象塑造。

首先，从李欲修的生平事迹观之，他秉持着一种“入乡随俗”的观念，学习当地土著的语言与文化，这种行为不单可以达到彼此相互了解，还可以让彼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进一步获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因此，精通爪哇文及当地土著语言成为李氏在交际方面中最大优势，更深获当地马来社会的拥戴，及拥有 Eh-ma 的称呼。

尔后，李欲修更在华人社会与吉打马来统治者及马来社会的交际方面，扮演着中介人的角色，以协助双方或多方面解决问题。同时，打破语言的障碍让李欲修获得更多机会与吉打王室接触，并让李欲修结识到当地达官贵人甚至吉打苏丹。李欲修透过与吉打苏丹或王室之间协商过程，渐渐的获得吉打苏丹的欣赏。因此，李欲修于 1850 年代被委任为华人甲必丹，以协助处理华人社会所面对问题，由于李氏担任甲必丹期间，长期介于马来社会与华人社会之间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这也为李欲修在日后政途奠下重要的基础。发展至阿都·哈密·哈林沙统治时期，李欲修更获重任，担任吉打财政司一职，经常获得派遣来往槟榔屿探讨两地税收课题。这足以证明李欲修拥有很好的协商及办



附图一：李欲修与其妻子坟墓（资料来源：陈鸿洲：《吉打风雨路》，亚罗士打：编者自行刊印，2005，第384页。）

事能力，深获吉打三任苏丹的重用，以体现出李氏在吉打华人社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最后，即是形象塑造，李欲修不管是在任何场合都充分表现其忠心于吉打苏丹及王室。其中，在1880至1882年之间所爆发的王位斗争，李欲修充分表现其的忠心，深获吉打苏丹的信任。除此之外，在一些场合还可以吉打苏丹委托李氏到典当铺赎回苏丹的金链以及前往槟榔屿商讨关于鸦片、稻米等等的税收。从吉打苏丹的举动观之，可以看到吉打苏丹非常信任李欲修。

总而言之，李欲修在吉打当地社会充分的将其的优秀的交际能力、协商或办事能力及良好形象表现出来，让其在吉打拥有崇高地位，并受当地人们及统治阶层的拥戴。除此之外，本文也厘清李欲修的生平事迹，也让后人能了解早期中华民族移民至海外之后，如何在异国他乡取得成功。

作者简介：阮湧伽，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

¹ Adi Haji Taham, *Perkembangan Sejarah Awal Negeri Kedah Berdasarkan Penemuan Bahan-Bahan Arkeologi*. Dalam Dokumentasi Konvensyen Sejarah Negeri Kedah. Lembaga Muzium Negeri Kedah Darul Aman, 1991, m/s 20–28.

² Kamaruddin Zakaria, *Lembah Bujang: Penyelidikan Arkeologi Sungai Mas, Kuala Muda, Kedah Darul Aman*. URL: http://www.mykedah2.com/10heritage/101_2_p3.htm, Date: 3 Jun 2014, Time: 2:30PM.

³ Wong, C. S.,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p. 47–62.

⁴ 阮湧伽：《马来半岛华人甲必丹制度的演变》，《史汇》，2012年第16期，第89页。

⁵ 阮湧伽：《马来半岛华人甲必丹制度的演变》，《史汇》，2012年第16期，第89页。

⁶ 阮湧伽：《马来半岛华人甲必丹制度的演变》，《史汇》，2012年第16期，第89页。

⁷ Ismail Haji Saleh, “Kapitan China: Baba Seng”, *Konvensyen Sejarah Negeri Kedah*, 28 November–1 December 1981, p. 3.

⁸ “Governor’s Miscellaneous Letter (Out). Vol V, No 1”, September 1824–July 1826,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Straits Settlement Record, M105/92.

⁹ Haji Buyong Adil, *Sejarah Kedah*,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80, m/s 74–75.

¹⁰ Wong, C. S.,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 54.

¹¹ Wong, C. S.,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 58.

- ¹² “Rencana Surat Beri kepada Phrak Norak Yuta Kaluang, Yang Bela Pelihara Pekerjaan Laut Matahari Jatuh fasal Cina Berkelahi di Kulim itu, 6 Shawwal 1305”, 16 Jun 1888,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Branch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No 2] Surat-surat Pajak, 1886-1894.
- ¹³ “Forwards Report From A.C.P. Assistant Corporal Police Joyce, Which Reflects Gravely On The Conduct Of Low Ah Lip, Captain China In Kulim”, 18 April 1915,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Kedah Secretariat File, No. 1309/1333
- ¹⁴ 陈鸿洲：《吉打风雨路》，亚罗士打：编者自行刊印，2005，第383页。
- ¹⁵ Haji Buyong Adil, *Sejarah Kedah*,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80, m/s 74-75.
- ¹⁶ Wong, C. S.,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 54.
- ¹⁷ “Rencana pajak Kuala Muda Merbok Tahun 1294, 5 Dhu’ I-Qa’ dah 1294”, 11 November 1877,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Branch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No 15], Surat-surat Pajak, 1827-1887.
- ¹⁸ Wong, C. S.,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 54.
- ¹⁹ Wong, C. S.,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 57.
- ²⁰ Wong, C. S.,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 57.
- ²¹ “Bayar belanja Lee Yok Siew pergi bayar rial fasal harga tembaga lapos kapal api dan beri belanja makan di kapal Pulau Pinang, August 1886”,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Branch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No 1], Ini Kira-kira Terima Rial Hasil Pajak Kuala Muda dan Merbuk T.H. 1300-1304; “Belanja Lee Yok Siew fasal pergi bicara rial pada Lee Chan Tuan di Pulau Pinang”, March 1887,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Branch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No 1], Ini Kira-kira Terima Rial Hasil Pajak Kuala Muda dan Merbuk T.H. 1300-1304; “Belanja Lee Yok Siew pergi terima rial cagaran pajak berae Kota Setar pada Baba Lee Chan Tuan di Pulau Pinang”, April 1887,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Branch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No 1], Ini Kira-kira Terima Rial Hasil Pajak Kuala Muda dan Merbuk T.H. 1300-1304.
- ²² “Bayar belanja Lee Yok Siew dan gaji kerani melayu dan kerani china tiga orang”, 1883-1887,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Branch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No 1] Ini Kira-kira Terima Rial Hasil Pajak Kuala Muda dan Merbuk T.H. 1300-1304.
- ²³ “Titih Duli Yang Maha Mulia suruh Lee Yok Siew tebus rantai emas di pajak gadai dengan bunganya”, July 1886,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Branch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No 1] Ini Kira-kira Terima Rial Hasil Pajak Kuala Muda dan Merbuk T.H. 1300-1304.
- ²⁴ Wong, C. S.,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 58.